

吴仲炎 著

史志改革纵横谈

新视角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 视 角

——史志改革纵横谈

吴仲炎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视角:史志改革纵横谈/吴仲炎 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2
ISBN 7-307-00894-7

- I . 新…
II . 吴…
III . 党史—编辑工作—论文集
IV . D23—31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25

字数 301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0894-7/D·168 定价:14.00 元

自序

1981年大地回春之际，一个偶然的机遇把我从党校教学工作岗位推到地方志及地方党史征编第一线。这标志着我的人生旅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十年工作实践中，在宋侃夫、刘惠农、王克文、曾惇、辛甫、郭治澄、陆天虹、吕梁等同志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与党史办公室全体战友及厂大史志工作者协同作战，以新视角从事党史工作，紧跟改革步伐，贴紧现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领导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史鉴，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作了一点努力。在上述领导同志的指导、支持下，我与厂大史志工作者共同提倡并实践了“两个并举”（史与志并举，建国前与建国后并举），“两个结合”（征集与编研结合，专门力量与社会力量结合）的方针和方法，对建国后史志资料征编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靠拢现实、面向改革、进入经济主域、提高编研层次、转轨变型等方面，作了一点试验。尽管这种努力和探索很粗浅、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然而究竟是初生之犊，敢于解放思想，勇于独开蹊径，冲决樊篱，开全国地方党史工作注重社会主义时期的先河，并取得了初步经验和效应。

事业能否取得相应的效果，往往与天时、地利、人和分不开。这十年，我投入的劳动远不及前十年多，可在政通人和、史志应运而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值此新春佳节、普天同庆之际，我既感念宋侃夫、王克文、曾惇等领导人对武汉地方史志征编工作开拓、奠基、关怀、支持、鼎助之赤忱和丹心，又铭谢刘惠农、辛甫、郭治澄、陆天虹、吕梁等一批老领导对我的亲切指

导，更庆喜烈士暮年之幸逢盛世，使我捐躯之夙志得报效于桑榆。吾年已古稀，双目昏眇，杂病丛生，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十年探索，留下了一些断简残篇，成果菲薄散乱，难登大雅之堂；且史志步伐已大大向前推进，吾之原始成果更加相形见绌。然而以集体智慧铺垫和开辟的路基和轨迹仍值得回顾和反思：贴近现实，拓宽领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主脉，以经济建设为主域，力求适应时代需要，发挥史志社会功能的思路仍值得借鉴。继往而开来，温故而知新。基于上述的考虑，特从十年中散见于一些刊物的篇章选择若干篇，汇成一集，命名为《新视角——史志改革纵横谈》，自费付梓，献给同行师友，并藉以表达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一颗拳拳之心。集中收入对宋侃夫、王克文、曾惇、郭治澄这几位生前为武汉地方史志征编工作作出贡献的领导同志的回忆、悼念文章，以抒怀念之情，以表不忘之心。

吴仲炎

1994 年春

目 录

自序 (1)

• 第一篇 经验交流 •

1 联合采访好处多	(2)
2 开展专题征编工作的初步体会	(13)
3 实行两个并举 坚持两个结合	(22)
4 我市建国以来党史专题征编工作是怎样起步的	(32)
5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体会	(46)
6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初探	(51)
7 大任同肩试探寻	(56)

• 第二篇 史志编写刍议 •

8 编史四议	
——兼谈怎样开创史志征编工作新局面	(68)
9 以改革为指导思想 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78)
10 总结经验 继往开来	
——对编写建国以来党在武汉活动有关专题的一点建议	(93)
11 开拓前进 把老企业革命斗争史料征编工作搞上去	(103)

12	建国后党史征编工作深入开展需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	(113)
13	建国后地方党史专题资料编写的要求和方法……………	(126)
14	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	(144)
15	充分发挥老同志在史志征编工作中的作用……………	(160)
16	编史“六要”浅议……………	(172)
17	地方党史研究改革刍议与展望……………	(181)
18	适应时代的需要 充分发挥党史的功能……………	(191)
19	党史研究思维方法改革刍议……………	(204)
20	推进党史研究改革 实现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218)
21	党史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26)
22	党史为现实服务的突破口及有关几个问题……………	(231)
23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248)

• 第三篇 史志论坛 •

24	以生产力标准反思过去指导现在展望未来 ——编史修志中运用生产力标准的断想……………	(252)
25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到历史研究领域中来……………	(269)
26	人物志编写三议……………	(276)
27	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86)

• 第四篇 书序、书评及其它 •

28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的新举措……………	(298)
29	一项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成果……………	(301)
30	一本展现党的三十年历程的乡土教材……………	(303)
31	对地方经济史编研工作的新探索……………	(305)

- 32 武汉党史大事记编写体例和要求 (307)
- 33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309)
- 34 一部了解武汉建设武汉的好书
——喜读《当代武汉》 (311)

• 第五篇 人物回忆 •

- 35 俯首甘为孺子牛
——纪念宋侃夫同志逝世一周年 (316)
- 36 一片丹心照玉宇
——痛悼王克文同志 (326)
- 37 丹心昭日月
——曾惇传略 (332)
- 38 忆郭老 (356)

• 第六篇 余生抒志 •

- 39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 (370)
- 后记 (379)

第一篇

经验交流

1 联合采访好处多

（一）策

为了抢救武汉地区革命史料，从9月10日至11月10日，在《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政治志》编委会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以《政治志》编委会所属的工、青、妇、市委党校有关人员为基础，并邀请省总工会、市档案馆、市文物处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纪念馆的有关同志参加组成了《政治志》赴京联合采访组，到北京、天津、沈阳等地调访。联合采访组一共16人。由《政治志》编委兼办公室主任吴仲炎同志带队。市志办公室除派李泽同志协助工作外，还敦请《武汉地方志》编委吴正东、吕梁两位老同志为采访组顾问，指导采访组的工作。

两个月的联合访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访问了116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在武汉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方毅、朱学范、郭述申、伍修权、蒋南翔、钱之光、沙千里、帅孟奇、章蕴、张执一、宋侃夫、宋一平、夏之栩、李文宜、张金保、陈琮英、李昌、于光远、胡克实、黄民伟、聂菊荪、黄致祥，以及其他年逾花甲的老同志。还访问了中央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央党校教研室、中央党史史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工、青、妇运动史研究室等单位。通过访问，得到了极其宝贵的口碑资料，文物和照片。还组织了4位同志进中央档案馆，摘抄了许多中央文献。口碑资料和档案资料共100多万字。这次采访，不仅使我们对湖北、武汉几

个历史时期党组织概况、重大事件、重大争论、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及其活动等的了解有了轮廓，而且从宏观方面对党在几个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和历史背景也略见端倪。在获得资料的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访问线索，打开了资料征集渠道，办好了下一次进馆摘抄文献的手续，为全面开展资料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

二、通过采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党的革命传统的教育。那样多的高级教员现身说法，给我们讲党史，讲党的传统，讲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精神，讲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持久战、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讲总理、董老、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湖北武汉贯彻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历史功绩，讲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我们等于住了一次党校，教益良多，终生难忘。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对我们谆谆教诲，跟我们促膝谈心，平易亲切，使我们感到了党的温暖，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传统。

三、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深切体会到：编史修志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弄清楚党团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沿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活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需付出巨大的劳动，进行浩繁的资料收集、考证和核实工作。在访问中，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年事很高、体弱多病的老同志，他们有的病瘫，有的记忆很差，有的说话困难，有的前几天还能行动，过了几天却突然中风躺下。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抢救口碑资料的紧迫，只争朝夕。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抢救，补上党史、革命史这一课，那末，我们将上对不起革命先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四、通过采访，我们既摸索了《政治志》内部各单位协作的经验，也初步摸索了政治志各单位与文物处、档案馆等单位合作的经验，为今后在资料征集工作上、编纂工作上互相支援、互相协作，开辟了道路。小组同志不仅打胜了一场资料仗，而且打胜了一场思想仗。

(二)

在短短的时间内，是什么因素使联合采访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呢？

一、联合采访组受到老同志的极大支持和关怀

出访之前，我们曾顾虑：中央的老同志公务都那么繁忙，年事都那么高，又那么体衰多病。而且，有的老同志又已被访问过多次，他们是否愿意接见我们？联合采访组一到北京，便很快打消了顾虑。这是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对编史修志、抢救活资料，早有明确指示。作为历史见证人，老同志深感交好历史帐，帮助把党史修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委员黄致祥同志说：“湖北是我的老家，我应该为湖北、武汉编史修志，提供一些素材。”他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回忆当年老工人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生动情节，回忆大革命以来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他说：“我作为一个武汉生长的老工人老党员，对党组织有个建议：是不是可以象辛亥革命那样，也搞个纪念碑，或者搞个博物馆，纪念他们。”

方毅同志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正当出国访问的前夕，十分繁忙。但他在百忙中安排时间接待了我们，谈了将近一个上午。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董老在抗战初期在湖北武汉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伟大历史功绩。他说过去我们宣传得不够，今后要很好地加以宣传。他不仅提供了董老等同志和他本人在湖北武汉推动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当时在湖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参加七里坪训练班学习和工作的文祥、易鹏、漆少川等同志念念不忘，一再询问他们的近况，对他们很有感情。

郭述申同志在抗战初期是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现在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今年 76 岁，患糖尿病。他的夫人许云同志也

患了重病。但他(她)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郭老先后在他的办公室同我们座谈了3次。他系统而详尽地叙述了大革命以来党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抗战初期湖北、武汉党组织概况和活动情况,对重大争论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讲了自己的见解。他一再指示:回去以后,要把这次访问的资料,认真加以整理和消化。他郑重指出:修湖北、武汉地方志,搞清楚抗战初期那一段党史很重要。要对湖北省委那段工作作出正确评价。不能孤立地研究当时的湖北省委,要联系研究当时的长江局。他一再建议省、市委要把长江局问题作为重要课题,组织力量,花气力、下功夫,进行认真地系统地调查研究。他豪情满怀地表示:他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退居第二线,把晚年贡献给编史修志的大业。他要我们回来后向省、市委汇报,并且向省市委报名,作湖北武汉编史修志的一名研究员。

许多老同志在治病期间,抱病接待我们。著名的爱国人士“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同志,年逾八旬,喉部开了刀,正在输氧、打吊针。听说我们采访组是从武汉远道来抢救资料的,经中央统战部、医院和沙老同意,破例让我们进入了病房。沙老向我们提供了“蚂蚁社”的重要线索;我们跟踪追索,紧接着访问了年事已高、患了喉疾、右手瘫痪的何惧同志。何老不仅向我们讲述了“蚂蚁社”的大致情况,而且还找亲属帮忙,把放在床下的有关资料找了出来。还提供了一份沙老的回忆录。马次青同志是位半身瘫痪,言语模糊,年近八旬的老同志。他家门口贴着这样的纸条:“因病势严重,遵医嘱,不接见亲友来客。”但他接到我们的联系函件时,很快要老伴李涛同志3次打电话约我们去他家。接谈时,马老谈一句,李涛同志指着事先准备的提纲翻译一句。谈10几分钟,他咳喘不止,老伴要他休息,他坚持要谈下去。临别时,李涛同志说:“前些时有个单位约马老谈有关史料,我们拒绝了。你们是从武汉远道来的,我们非接待不可!”

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同志因脑部供血不足住进医院，医生不让他会客。但我们联系后，他很快通知我们去医院找他，并且要秘书在病房外等我们两小时。当我们进入病房时，他一口气向我们讲了“一二·九”运动中武大的党员、极积分子约 20 多人的姓名和住址。因为情绪激动，血压骤然上升，以至他面部通红。经秘书劝止，他才终止了谈话。临别时，他还要我们以后再去找他。

许多老同志在接待外宾、开重要会议、参加重要活动的紧张时刻接见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在接待外宾的国庆前夕接待了我们，从下午 3 时一直谈到 5 点多钟。秘书提醒他晚上要参加重要晚会，他才暂时结束这次接谈。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马上要去开会，国庆后再约你们继续谈”。他主动向我们提供了阳翰笙同志等线索；要我们写信给他，由他转阳老。临别时他将亲笔写成的回忆录赠送了我们一份。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同志在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开会期间，抽空接待我们，详细而激情地回忆了大革命期间党中央机关在汉口的旧址和组织情况、活动情况。全总副主席黄民伟同志在重要会议期间两次接待我们。在第二次接谈时，还作了认真的准备。他把他主持的业余歌咏团的情况和抗日歌曲写出来，边讲边朗诵歌词，激昂慷慨，动人心弦。他让我们把《我们是一群战斗的青年》歌词带回武汉。

一些老同志认真为我们审阅和修改访问整理稿。杜林大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执笔撰写大革命时期湖北女师学潮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铭大姐特地为我们写了抗战初期汉口区委的组织情况资料，并且提供了有关资料，特别是当时长江局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以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等资料。这些资料都对我们编史修志帮助很大。

有些老同志在百忙中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沈阳市副市长李立权同志，在会议刚散、饭也没吃，就赶到招待所来找我们，向

我们提供有关资料。张静、陈尚文、孙仕祥等同志也找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孙士祥同志先后同我们谈了5次，还答应将他自己整理过的材料交给我们参考。

有些老同志在接到我们的预约信后，专门作了准备。郭佩珊同志在我们访问之前，就写了回忆材料。梁立琳在接到我们的电话时，热情洋溢地要我们快去。在接谈时，她滔滔不绝。她对我们说：“你们受组织委托，抢救资料，编史修志，非同一般。我们当然要热情接待！”

王翰同志的夫人张清华同志，为了使我们对王翰同志生前的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不仅自己努力回忆，而且还找一个单位笔录了王翰同志在“清队”中写的材料，供我们参考。范元甄同志不仅系统而详尽地叙述了青年救国团和民族先锋队等青年组织的情况，而且还翻箱倒柜找出了21张保存40多年的极其珍贵的照片供我们复制。章蕴、李沫英、帅孟奇、刘子谷、陈维清等同志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照片。张静同志不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还帮我们借汽车，陪我们走访老同志。我们要去沈阳访问，她怕我们受冻，给我们借了棉大衣。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同志跟我们接谈后，还同意为我们转交约访函件给蒋南翔同志，并为我们修改访问提纲。胡克实同志为我们亲笔写信给从长春来京的李光同志，请他向我们提供有关情况。于光远同志本来已乘车到医院探望岳父，怕耽误我们访问，特地中途回社会科学院，专程接待我们。

二、做过细的思想、组织工作，充分发挥联合访问的优越性

市里统一组织的联合采访，具有很多优越性。

其一，它的影响较大。联合采访组所到之处，向中央、北京等地的老同志和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汇报了武汉编史修志的进展情况和这次组织联合采访的活动，起到了编史修志宣传队的作用。普遍反映：象武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这样下决心编史修志，不功夫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联合访问，确实是个好经验、好

办法。由于联合采访影响较大，多方重视，因而办起事来比较顺利，如向中组部请求查阅几位去世的老同志的人事档案，很快得到批准。

其二，它集中各种人才、各方智慧，集思广益，有利于发挥各单位的优势。文物处李婉霞等同志在京的关系较多，又熟悉有关史料，可以随时上门谈心。她善于提问和提示，与被访问的老同志常常达到情感交融和思想共鸣的境地，受到老同志的热情欢迎。妇联刘茂舒同志，与一些老大姐推心置腹。有的老大姐已经同她谈了，过几次又打电话要她去深谈。市档案馆的同志与中央档案馆有业务联系，该馆陈辉汉同志通过在京学习的市档案馆负责人找了中央档案馆负责人，很快打通了渠道，减少了许多繁琐手续，方便了我们进馆摘抄资料。联合采访组是老中青相结合，老兵和新兵相结合。吴正东等同志在京的老战友较多，他们千方百计地穿针引线，当好“红娘”，为打开局面、深入访问，尽了很大的力量。中年同志充当牵头人和骨干，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资料工作。青年同志敢冲敢闯，虎气很大。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通力协作，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发挥了很大的优势。真是人众智慧多，力量大，路子宽，信心足，热气腾腾，干劲十足。

其三，它有利于互相协作和支援。彼此之间互供资料，互通情报，互提线索，互带任务，做到“出去一起抓，回来再分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市档案馆同志将馆里有关资料复制几份带出来专供小组同志参考。各家访问的材料和摘抄的材料共同利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发扬了团结协作的新风尚。

其四，由于联合采访组由市统一组织，各有关单位联合行动，因而受到市有关部门、单位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市志编委会陆天虹等同志多次来信鼓励，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梅芳同志专程从全总招待所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协助解决住宿问题。

联合采访组有很大的优越性。许多同志表示：联合采访事半功

倍，一人顶几人，一天顶几天，今后再组织联合访问，一定报名参加。但是，联合采访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人多而想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殊要求和工作方法。要充分发挥联合采访的优越性，使采访工作收到最大的效果，象交响乐队一样协调地演奏出精采的乐章，必须自始至终作过细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辩证地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统一性和灵活性、联合和分散、访问和整理、口碑资料和档案资料的关系，达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我们的思想组织工作的作法是：

(1) 充分准备

我们到北京正式采访是在9月中旬。但采访的准备工作，早在7月初就开始了。在7、8月份酷暑的日子里，《政治志》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的同志座谈讨论，举办讲座，四处奔跑，了解线索，查阅资料，草拟篇目或大事记，撰写访问提纲，发出预约函件，以及临行前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资料准备和生活准备，包括派出先遣组提前赴京联系招待所，等等。应该说，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在临行前几天召开的《政治志》编委会上，陆天虹、吴正东等同志又强调了抢救活资料的重要性、紧迫性；强调了访前的准备工作及访问中一定要整理好记录；强调在实践中探索协同作战的经验，以革命精神进行采访工作，为抢救资料、编史修志作出贡献，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鼓舞了士气。访问时我们带去了事前准备好的有关资料和当年的照片，引起访问对象回忆；访问中又将从其他访问对象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供访问对象参考或讨论，效果是好的。但在生活准备方面，我们对北京招待所紧张情况估计不足。我们一行十几人分居几处，还接二连三地搬迁多次，给采访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2) 抓紧访问

由于先遣组王道举、姚卫东等同志事先安排了住处，同志们一到北京，放下提包，买好车月票，就四出联系访问对象，开展访问活